

第四卷

武汉出版社

杜维明文集

的思想模式。梁和輝要把這本東西弄到元原

裏三十年的。但付勝自覺達到了，

七至七十年八十年代。

的新中國，舊社會層也

舊社會層一座面改造的過

白銀洗淨。要達到這

五經四書這種對人民的精

一定得教訓也非教年

神最有害的



自從五四運動以來，讀中國古書白話語分子已

乃全盤西化

杜维明文集

第 肆 卷

郭齐勇 郑文龙 编

武汉出版社



► 1998年5月30日
在哈佛燕京学社与本文集编者郭齐勇交谈后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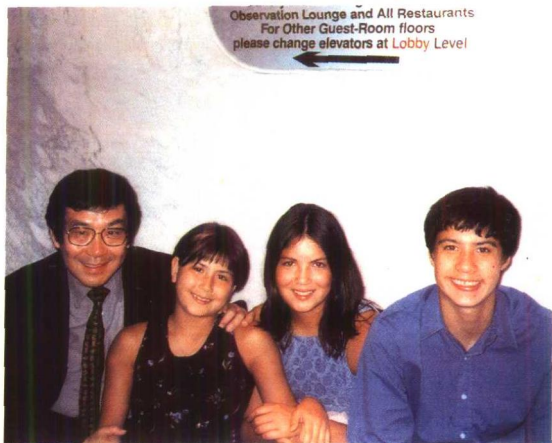


◀ 1999年10月15日在
武汉大学“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致开幕词。



► 1997年5月在美国
麻省康桥赵如兰院士寓所座谈文明对话与儒家
人文精神。

Observation Lounge and All Restaurants
For Other Guest-Room floors
please change elevators at Lobby Level



► 1998年在新加坡（从右至左：杜亚伦、杜美灵、杜文云）。



◀ 1998年7月25日在韩国成均馆大学建校六百周年明伦堂前庆典上。



► 1998年旅行期间构思《文明对话与儒家传统》。

目 录

仁与修身 儒家思想论文集

联经中文版序	(3)
原 序	(7)
导 言	(9)
第一部分 古典儒学思想	(14)
一 “仁”与“礼”之间的创造性张力	(14)
二 作为人性化的“礼”	(25)
三 儒家的成人观	(41)
四 论孟子的道德自我发展观念	(61)
第二部分 宋明儒学的思考模式	(72)
五 宋明儒学的“人”的概念	(72)
六 从宋明儒学的观点看“知行合一”	(82)
七 内在经验;宋明儒学思想中的创造性基础	(99)
八 心与人性(书评论文)	(106)
九 重建儒学传统(书评论文)	(113)

十	主体性与本体论的实在性 ——王阳明思维模式的诠释	(128)
十一	王阳明四句教考	(148)
十二	作为哲学的转化思考(书评论文)	(161)
十三	颜元:从内在体验到实践的具体性	(167)
第三部分	现代儒学思想体系	(194)
十四	熊十力对真实存在的探索	(194)
十五	儒家思想:近来的象征和实质	(228)

文化认同与创新

文化两极与两栖文化

——海外中国知识分子的适应与认同诸问题初探	(267)
以开放的心灵接受传统的挑战	(277)
与张系国、沈君山谈 21 世纪	(281)

儒学发展的前景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研所座谈会评述	(313)
-------------------------	-------

再谈儒学发展的前景问题

——读张春波《座谈会述评》后的两点感想	(321)
中国文化的认同与创新(提纲)	(324)
中国文化的认同及其创新(全文)	(332)
海外中国文化研究概况	(359)
从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看中国文化发展的前景	(390)
儒学与西方文化	(416)
大陆儒学新动向的涵义	(422)
大陆知识分子的儒学研究	(429)
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涵义(提纲)	(437)

目 录

致林同奇	(440)
《儒学发展的宏观透视》序	(442)
从亚洲危机谈工业东亚模式	(446)
儒学的理论体系与发展前景	(463)
传承与创新	(470)

宗教向度

宗教学：从神学到人文学

——哈佛大学的宗教研究	(495)
-------------------	-------

苦参·传心·弘法

——禅宗在北美发展的内因	(507)
--------------------	-------

重建理性沟通和开放性

——与梁燕城先生就儒学和基督教的一场对话	(514)
----------------------------	-------

儒学的超越性及其宗教向度	(529)
--------------------	-------

儒家人文精神与宗教研究	(550)
-------------------	-------

论著选译

儒教东亚兴起的涵义	(585)
-----------------	-------

修身	(605)
----------	-------

个人、社群与道

——古代群体批判的自我意识的出现	(631)
------------------------	-------

对全球社群之核心价值的儒学透视	(647)
-----------------------	-------

心、性、情

——新儒家精神性文化观的增势	(657)
----------------------	-------

修身作为体现人性的教育	(673)
中国哲学概览	(686)
全球社群	
——探寻社会发展的精神资源	(707)

仁与修身

儒家思想论文集

胡 军 于民雄 初译

张端穗 译校

邵东方 再校

1979年伯克莱亚洲人文出版社最先出版本书英文版，本次底本系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2年6月初版之中文译本。

联经中文版序

二十四年前(1966年),我从台北寄出一篇英文论著给夏威夷的《东西哲学》杂志主编摩尔(Charles A. Moore)先生。不久收到他的回信,两整页不空行的长篇,对我的构思行文都作了严厉的批评;特别是针对我声称仍属“初稿”,他提出了尖刻的抗议:即使是自命不凡的哈佛研究生,也绝不应把尚未完成的作品投递到享有国际声誉的学报!不过,在最后一段,摩尔先生竟心平气和地说,这篇文章确有“希望”,如果我修订后正式投稿,他愿意慎重考虑出版。不久,摩尔教授仙逝(夏大为了纪念他创办《东西哲学》杂志及主持东西哲学家会议的业绩,近年来还特别建造了一座摩尔大厦表示敬意),摩尔的继承人道启(Eliot Deutsch),接掌学报不久即来信联系。本书所收的第一篇就是1968年在《东西哲学》发表的《“仁”与“礼”之间的创造性张力》的中译文本。对这个课题的探索揭开了我从事反思儒家哲学中心价值的序幕。《作为人性化的“礼”》(第二章)和1970年12月在印度的马德拉斯(Madras)宣读的《从宋明儒学的观点看“知行合一”》(第六章)都是同类的工作。

1968年我完成了以分析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为主题的博士论文,正式走上以教研为主要关切的学术之旅,阳明的“致良知”一直是我所关切的哲学问题。我总觉得,阳明自称经过“百死千难”才悟出的道理与时人因获取太易而所论,常如隔靴搔痒,没有什么可会通之处。《主体性与本体论的实在性——王阳明思维模式的阐释》(第十章)和《王阳明四句教考》(第十一章),即是设想进一步体会阳明教言的尝试。《四句教》一文是应西谷启治和阿部正雄两位日本哲

人的邀请而撰得的,因此在《东方佛学》(*Eastern Buddhist*)刊出。

《心与人性》(第八章)是评介牟宗三先生《心体与性体》三册的论文,《重建儒学传统》(第九章)是评介钱穆先生《朱子新学案》五册的论文,《作为哲学的转化思考》(第十二章)则是评介丁博(Dimberg)先生《圣人和社:何心隐的生涯与思想》(英文)的短篇。这三篇书评(前两篇刊在《亚洲学报》,后一篇刊在《东西哲学》)把宋明儒学中的身心性命诸问题提到学术议程之上。1970年在亚洲学会宣读的《宋明儒学的“人”的概念》(第五章),虽是一般综述,但也是对美国汉学界只从政治意识形态来认识儒家传统的陈见提出质疑。近年来,在欧美学界从道德哲学、比较宗教学及美学的角度来发掘儒家传统精神资源的例子已屡见不鲜,但回顾二三同道孤军奋斗的往事难免会有创业维艰的叹息。

1975年应“美国人文、科学和艺术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之邀,为其以希腊建造迷宫和发明人翼著称的巧工《代达罗斯》(*Daedalus*)命名的杂志撰文。《儒家的成人观》(第三章)能通过这个媒体流传英美知识界是难得的助缘。《论孟子的道德自我发展观念》(第四章)刊在《一元论者》(*The Monist*)也达到了和欧美专业哲人交通的目的。《内在经验:宋明儒学思想中的创造性基础》(第七章)则刊在由普林斯顿美术馆出版的《艺术家和传统:中国文化中的古为今用》一书中。因为这篇感性的短文在美学界结识了不少道友,这是意料之外的收获。

《颜元:从内在体验到实践的具体性》(第十三章)和《熊十力对真实存在的探索》(第十四章)两篇学术论文都是在美国学术联合会资助的国际研讨会中提出讨论的。我深信通过对塑造儒家传统有贡献的人物的理解来阐述身心性命之学的真实内涵,不仅有助于对儒家哲学的中心价值进行深层的反思,而且可以为获取儒门的人生智慧创造良好的条件。其实,“亲师取友”乃至“尚友千古”本是“吾儒家法”。如果能通过原始资料(书信、语录、自传、论说等等),私淑几位古今大儒,那将会受益良多。

《儒家思想：近来的象征和实质》(第十五章)是在文革风暴期间(1974年)草就的，本来没有发表的意愿，但因不能预期也无法控制的原因而刊行流传，还引起了一些反响，也就顺其自然，由其自生自灭。不过，当时所获得的材料充分显示“儒家论说”(Confucian discourse)是认识大陆思潮不可或缺的了解背景(background understanding)；对一个只能从书写文字(而不是面对面的交流)来揣测大陆学风的思想工作者来说，能把儒家中心价值提出讨论而且受到从事当代中国研究的国际学坛的重视，已是弥足珍贵了。固然，今天儒家传统与中国现实的紧密相关性，已是不刊之论，虽然从正面肯定或从负面否定的立场尚多争议，但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强调儒家正面的重要性，需要俊劲也需要勇气。

这本论文集曾由北京大学的胡军和于民雄翻译为中文，以《人性与自我修养》为书名，收入中国文化书院所刊行的中国文化与文化中国丛书里，由北京的中国和平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我很感激胡、于两先生在写作环境极差和时间压力极大的困难中帮助我把“儒家信息”在大陆传达。我曾收到湖南乡下一位年仅15岁的少年因读《人性与自我修养》有所兴发而寄来的问学书。他不赞成我所谓“儒门淡薄”的悲观，而且建议我为某些过分“欧化”的语词作一些必要的修订，这类回响使我振奋。不过大陆版没有原序(多半读者不知道这些论文都是15年前用英文发表的旧作)，又因刊行仓促把脚注全部删除，而且文字错误也特别多，不能反映英文本成书的“艰苦”。

承蒙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总编辑林载爵教授的厚意，我很高兴这本论文集的中译本能有重新在台湾刊行的机会。东海大学的张端穗教授不仅把脚注全部译出，而且重新详阅大陆版，作了比重译更艰难的校讎工作，使全书面目焕然一新(譬如第十三章便彻底重新翻译)。大陆版原有庞朴的丛书总序和汤一介为《人性与自我修养》撰写的前言，我接受了联经编辑部的建议为联经版撰写了这个新序，说明原委。因此，庞、汤两序只好割爱。

我虽然常用中英双语撰文，但在翻译自己论著方面却乏善可陈。

固然我不愿只停留在“双语主义”(bilingualism)的层次,其实,严格意义的“翻译”正是我努力的目标,但我从来没有把自己的英文(或中文)论著翻译成中文(或英文)的奢想。我是希望从中英双轨的实践中汲取培养语言能力的经验,能否相得益彰,当然不能只从“双语主义”来证成。因此我由衷地感激张端穗教授的这番苦心(不必提苦工了)。最后,虞韵琴悉心校对全稿,改正不少错误,一并在致致谢。

杜维明

1991年10月于
美国,麻州,康桥

原 序

1977年的春天,已故社会研究新学院纳尔逊(Benjamin Nelson)教授建议我把几篇业已发表的儒家思想论文集结成书。他并主动提供正由他主编的一系列有关比较文明研究的专论作为出版的渠道,同时他还答应为我的论文集写序,从比较文明学研究的角度,介绍我的学术工作,使我极感欣慰,也倍觉荣幸。1977年9月17日纳尔逊教授在德国旅行时不幸去世。他的逝世对我们这些深受其充满活力的人格所感召、其生趣盎然的学术所鼓舞的文化工作者,确是一大损失;尤其是我本人,对这位敬爱的“师友之间”人物的猝然离去更感到悲痛。我们原已商定准备共同撰写三篇从比较文明学的角度来探索中国和西方的论文,其中一篇是以中基督教的“良心”(Conscience)为线索,集中探讨宋明儒学关于“心”的概念。

由于我的同事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东方语文系兰克斯特(Lewis Lancaster)教授的鼓励,我终于鼓起勇气把这几篇论文安排成专著的形式。他所主持的“亚洲人文出版社”决定重新排印全稿,为我提供了改正一些错误和进行少量校订的机会。我很感激阿德勒(Joseph Adler)先生、湘纳(Betsy Scheiner)女士和汤普森(Tracy Thompson)女士在这方面给我的协助。

我对在历史和哲学界不断从学术上给我以支持的老师和朋友也表示真诚的谢意。我想特别提到这些年来对我启发良多的谈友:(以英文字母为序)张灏、陈荣捷、陈启云、狄百瑞(Wm. T. de Bary)、洪铭水、林毓生、刘子健、刘述先、梅广、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牟复礼(Fritz W. Mote)、吉德玮(David N. Keightley)、湘纳(Irwin

Scheiner)、史华慈(B. I. Schwartz)、魏克曼(Frederic E. Wakeman, Jr.)、杨联升和余英时。我也要感谢由美国学术联合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所支援的“伯克莱儒学研讨会”的会员们;近年来他们对我学术工作的批评和指正确使我眼界大开。我尤其要对余约翰(John Ewell)先生、研讨会的秘书和记录员表示万分谢意,这里所收的好几篇论文的初稿都经过他们精心的审阅和批评。

同时我必须提到,由已故唐君毅教授以及牟宗三、徐复观教授所领导的“东方人文友会”虽然没有直接参加我在美国的“经院式”的反思活动,但“友会”(长期非正式的学会)诸公所创建的那个纯粹以人文精神相提携、且饶有人生意义的“沟通世界”,却经常为我的工作提供滋养。

杜维明

1978年6月于

美国,加州,伯克莱

导 言

儒家思想是人类历史上最丰富、最悠久的历史传统之一。本书中的十二篇论文及三篇书评论文是我企图了解儒家思想的一些研究成果。经过再三思考,我在这些初步探讨所研究的内容后选择了“精神”(Spiritual)这个词。首先我必须指出,我的目的在于:以一种分析的、描述的方式来检讨儒学思想模式的某些显著特征。我对这些问题的论述或许会为儒学传统加上一层积极的色彩,但这是出于方法论的考虑,而非蓄意维护一套受人诋毁的思想体系。

当然,我以为使我倾心的儒家知识只有少数研究中国思想的同仁与我分享。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和大部分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注重所谓的儒家文化的“阴暗面”。作为一个思想史学家,我当然敏锐地注意到了儒家对传统和现代中国所起的负面作用(如专制政治、老人政治以及男性为取向的实质等)。在我看来,最近几十年间多次的反孔运动高潮(文化大革命中的批林批孔可能是例外)是20世纪中国最优秀的思想对一种业已过时的生活方式进行严肃的思想批判的组成部分。

然而,用现代的观点来评价儒家思想是一回事,而以现代意识形态中所谓的优势,不论是科学主义、民族主义或社会主义,来抨击儒家的象征系统却是另一回事。前者是以发现的精神来试图理解及正确理解一个文化现象的一种诠释的艺术;而后者却来源于善辩者的说教,其明显的目的在于把一个传统化约成一套公式的权法而已。近代中国某些最优秀的思想家积极参与多次重新评价儒学传统的事实,说明了在致力中国的现代化者眼中传统的处境堪忧。但当我们